

文献研究

《史记》

张大可著
民族出版社



张大可著

史記文獻研究

劉乃和題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卓玛吉

装帧设计:翟跃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文献研究/张大可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12

ISBN 7-105-03647-8

I. 史… II. 张… III. 中国—古代史—记传体—史记—研究
N.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272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慧田禾三工作室照排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24.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由四个部分组成，前三个部分为作者论著《史记文献研究》，第四部分附录，书评十篇，为学术界对作者《史记》系列论著主要书目的评论。

《史记文献研究》第一部分：《序论——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与文献价值》，回眸本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与成就，提供了《史记》研究的前沿信息。第二部分：正文余章，系统阐述了《史记》的文献依据与价值，以及《史记》流传概况。这一部分是作者八十年代初在兰州大学开设《史记》专题课的一部讲义，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历史检验，仍有出版价值，足见作者功力。第三部分是对《史记》文献专题研究的论文七篇。

本书是学习《史记》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可供大中专师生及《史记》爱好者参阅。

题记

本书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序论——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与文献价值”，回眸本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与成就。第二部分：正文八章，系统阐释了《史记》的文献依据与价值。第三部分：论文七篇，属于《史记》侧重文献的专题研究。三个部分写于不同的时期。正文八章，原题《史记研究》，是八十年代初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开设《史记》专修课的讲义，编撰最早，兰州大学教材科刻印于1981年10月。我在开课中陆续发表专题论文，到了1985年结集出版，题名《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收入本书的七篇论文是1985年以后陆续发表的，故未收入《史记研究》论集中。《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与文献价值》是为《史记研究集成》所作的断代综述，收入本书加“序论”两字，与全书内容贯通。由上所述，本书断断续续写成，前后历经二十年，一方面说明学术深入

之不易，另方面由于本人的持续研究，本书所收虽然是系列研究中的散论，但这些散论的共同主题，是探索《史记》成书的文献依据，以及“史记学”发展中的文献价值，故而题名“史记文献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史记》研究领域的一个开拓，因而结集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唯有《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史记》之树生命常青，除“百科全书”这一根本原因以外，它还有四大特点：其一，《史记》体大思精，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其二，《史记》蕴含的思想，是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哲学；其三，《史记》所创造的历史与文学的成就，遗泽后世；其四，司马迁崇高的人格，创新的精神，激励人生奋发有为。正由于《史记》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因而成为中国学人的根基书。司马迁的思想、精神、人格对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至于不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就有中国文化研究从何谈起之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记》日益走向普及，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由古及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长串的名流学者涉足这一领域。汉代学者大家班彪、班固父子，文献学家刘向、褚少孙，哲学家扬雄、王充；唐宋文学八大家，史学家刘知几、郑樵，哲学家二程、朱熹等数十人；清代的考据大家与文史哲各界学术泰斗如顾

炎武、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万斯同、王念孙、阎若琚、章学诚等，不胜枚举；近现代的学者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胡适、鲁迅、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今人朱东润、程金造、陈直、杨向奎、钱钟书、蔡尚思等，也为大家所熟知。据统计，历代以来，研究《史记》的作者达 2000 余人，留下的论文有 3500 余篇，论著 293 部，总字数 11000 万字，这是其它古代文化典籍不可企及的。《史记》的普及在当代成了一个热门课题。自 80 年代以来，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持续在百篇以上。从 1980 年到 1996 年，17 年的数据统计，作者达 1200 余人，发表论文 1800 余篇，出版论著 131 部，总字数 6000 万字。当代《史记》研究不到 20 年，其研究成果占两千年来《史记》研究总成绩之半。因此可以说，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研究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其标志有三个方面：一是队伍宏大，成绩显著；二是方法更新，中青年学者大放异彩；三是协作攻关，总结性的界碑工程提上议事日程。总结性的界碑工程主要有两项。其一，由陕西司马迁学会主持的《史记会校会注会评》，集训诂之大成；其二，由我牵头有多所高校协作的《史记研究集成》，总结两千年来古今中外“史记学”研究成果精义于一编。“集成”工作起步于 1990 年，1994 年召开了编委会，并得到了国家教委古委会的支持。浙江师大俞樟华教授、河北师大王明信教授、内蒙古师大可永雪副教授参加了编委会，他们长期襄助这项工程，情谊感人。

由于本书大部分内容将收入《集成》中，因此特借此机会，宣示《集成》工作，并向参加《集成》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集成》是一项艰苦的学术工程，有的中途而退，有的只是索取，投机取巧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但我们仍然信心百倍，更将加快工作，按计划在2001年新世纪来到之时出版。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昭示，也是正名，使钻营之徒汗颜。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人支持，也希望这本书能给《史记》爱好者带来裨益。

作 者

1999. 5月

目 录

题 记 (1)

序 论

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与文献价值 (1)

史记文献研究

第一章	《史记》产生的环境与条件	(53)
第二章	司马迁传略	(73)
第三章	《史记》名称与断限	(98)
第四章	《史记》体制	(130)
第五章	《史记》取材	(148)
第六章	《史记》残缺与补窜	(171)
第七章	《史记》义例和司马迁的历史观	(203)
第八章	《史记》流传	(242)

论 文 七 篇

崇高的人格 创新的精神

——纪念司马迁诞辰二千一百三十周年	(270)
司马迁一家言之界说	(277)
司马迁的战争观	(290)

司马迁写汉武帝征伐匈奴	(314)
马班异同的内容与发展历史	(333)
《史记》十表之结构与功用	(350)
《太史公自序》解读	(365)

附录：书评十篇

一本系统研究司马迁的论集问世

——读张大可《史记研究》…………… 柯昌基(377)

史记研究的新成果

——评介张大可的《史记研究》…………… 唐少卿(382)

颇具特色的史学论集

——试评《史记研究》…………… 黎尚诚(391)

角度新颖,见解深刻,论证科学

——读张大可同志《史记论赞辑释》…………… 韩兆琦(394)

一本研究司马迁史论的书

——《史记论赞辑释》评介…………… 唐少卿(399)

《史记全本新注》评介…………… 钟岱(404)

中国古代思想家“碑林”中的一座丰碑

——读张大可的《司马迁评传》…………… 宋嗣廉(413)

《史记》研究的最新成果

——读张大可先生《司马迁评传》…………… 来可泓(420)

富有特色的《司马迁评传》…………… 韩兆琦(425)

如何写好历史名人评传

《司马迁评传》评介…………… 赵吉惠(431)

序 论

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与文献价值

引 论

《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和研究它，因而《史记》早已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世界级文化名人，集文、史、哲、经于一身的全能作家。《史记》全本在朝鲜、日本已流传一千四、五百年，它的部分传记在本世纪翻译成俄、英、德、法等文。前苏联及美、英、德、法等国的汉学家均开展了《史记》的研究。日本的《史记》研究，历代累计名家学者一百余人，其成就可与中国的“史记学”成绩相颉颃。所谓“史记学”，就是指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术体系。1949年后，中国的“史记学”研究分为大陆与台湾两支发展，各自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目前的形势，中国大陆、台湾与日本形成鼎立格局。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史记学”研究迅猛发展，逐渐占优，已持续十余年，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研究队伍迅猛发展，研究成果以加速度的趋势递增，许多高等院校开设了专门的《史记》课，有的高校还成立了《史记》研究室。这些标志着当代

《史记》研究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可以预期，到本世纪末的世纪之交时，中国大陆的“史记学”成就将突出为不可企及的优势，遥遥领先于中国台湾和日本，而且整体成果将给中国“史记学”发展带来里程碑的价值定位，试评述如次。

一、二十世纪《史记》研究概说

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从方法与内容来分析，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姑定名为“近代”、“现代”、“当代”，加上“古代”对照，共为四个发展阶段。评估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探索它的发展趋势，最简明的方法是作全面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并把整个古代研究成果作为参照物进行比较，发展脉络，一目了然。下分三个层次来谈。

1. 二十世纪《史记》研究总成果与发展阶段 下列三表统计两千多年来“史记学”发展的总成果，以突现本世纪的成绩。时间断限，古代从汉至清末，时间跨度 2000 年。近代，数据统计从 1905 到 1949 年，时间跨度 45 年。现代，数据统计从 1950 到 1979 年，即建国后的前 30 年。当代，1980 年以来，数据统计，论文截止到 1994 年 6 月，论著截止到 1996 年底。当代《史记》研究已历 15 年，还未到达顶点，其发展势头将到公元 2000 年世纪之交时告一段落。其标志是多项总结性的界碑工程将在此时结束。数据统计的资料来源有四项：一是 1957 年中科院历史所编印的《史记研究资料和论文索引》，二是 1989 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杨燕起、俞樟华合编的《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题要》，三是 1995 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徐兴海主编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四是笔者正在参与的《史记研究集成·索引》。论著的篇、部及作者以资料条目计数，较为精

确，字数为估计比实际偏低，误差较大，仅提供对照。

表一、论文统计

时代	篇数/%	字数(万)/%	作者/%	人均篇数	备注
古代:两千年 (汉－清)	1435/ 41%	100/ 7%	385/ 21%	3.4	当代 15 年与总量之 比：
近代:四十五年 (1905－1949)	228/ 6.6%	200/ 14%	164/ 9.1%	1.4	篇数占 46%
现代:三十年 (1950－1979)	206/ 6.4%	150/ 10%	169/ 9.4%	1.2	字数占 69%
当代:十五年 (1980－1994)	1635/ 46%	1000/ 69%	1079/ 60%	1.5	作者占 60%
合计	3504 篇	1450 万字	1797 人	2	

表二、论著统计

时代	部数/%	字数/%	作者数/%	人均部数	备注
古代	101/ 37.5%	3000 万/ 32%	98/ 42%	1.06	当代 15 年与总量之 比：
近代	31/ 11.5%	800 万/ 8%	30/ 13%	1	部数占 39.
现代	30/ 11.5%	800 万/ 8%	21/ 9.5%	1	5% 字数占 52% 作者占
当代	131/ 39.5%	5000 万/ 52%	82/ 36%	1.3	36%
合计	293 部	9600 万字	231 人	1.17	

表三、论著分类统计

时代 部数	文献研究					思想研究					工具书	白话史记	选本	通俗读物	其他
	部数/%	考证	全本注疏	辑佚	资料	部数/%	论著	论文集	评传						
古代 101	101/ 100%														
近代 31	13/ 41%	12	1			14/ 45%	14			1		3			
现代 30	5/ 17%	4	1			2/ 7%	1	1		2		13	5	3	
当代 131	8/ 6%	1	4	1	2	54/ 41%	39	12	3	9	6	20	29	5	

《史记》研究的发展阶段，在表三的论著分类统计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古代传统《史记》研究，偏重微观，在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方面下功夫，方法是抄撮材料，排比引证，集甲说乙云，这就是乾嘉考据的治学方法，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是传统方法的一个界碑。传统方法历经两千年没有多大改变，存世的101部论著，均属微观“文献研究”。

近代《史记》研究，正值二十世纪前半叶，清末和民国时期，资产阶级思潮占统治地位。前有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启迪，后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以及马克思主义新思维的传入，传统方式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史记》研究出现新局面。这一时期的名作，如李景星的《史记评议》（1932）、靳德俊《史记

释例》(1934)、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都用宏观方法研究思想义理为主。考据著作如朱东润的《史记考索》(1943)也是考论结合，开创了新例。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是一部考证论辨的名作。近代论著31部，其中“文献研究”13部，“思想研究”14部，大体平分秋色。

建国以来45年，是文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新方法研究《史记》的新时期，是一个历史阶段。由于政治起伏，形成了前30年与后15年《史记》研究的不同局面，因而分为两个时期来谈，即表列的“现代”与“当代”。前30年因文革运动的中断，实际只有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15年。时间短，一代新人未成长，又是新方法运用的发轫期，大家还很不熟练，论著以普及读物为主导，多为小册子。具有时代界碑价值的论著有五种，均属“文献研究”，即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959)、贺次君《史书记录》(1958)、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1963)、陈直《史记新证》(1979)、钱钟书《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1979)。这五种论著均出自前辈专家之手，实质是近代《史记》研究的延伸。这一时期有特色的《史记》研究是数十位史学界前辈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他们精辟的论述和号召力，奠定了新时期《史记》研究的基础，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中翦伯赞先生是在新中国学术界第一个发表《史记》论文的学者，启动了《史记》研究。他的论文《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发表在1951年《中国青年》总第57期上。这虽然只是一篇知识性的评介文章，但有理论深度，文风一反旧时代研究者的那种堆积史料和文字艰涩的毛病，议论简洁明快，文字流畅，且发表在通俗刊物上是有意识地向青少年介绍这部古代名著，对《史记》的普及和研究开了一个新生面，是颇有影响的。嗣后，金兆梓、季镇淮、荣孟源、汪篯、侯外庐、高亨、尚钺、李长之、吴晗等前辈都先后写了通俗性的《史记》评介论文，对推进《史记》的研究起了宣传

和号召的作用。1955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六期上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发起了一场围绕司马迁生卒年问题的学术讨论，尽管这场讨论在解决司马迁生卒年上没有形成定论，但以此为契机推动了《史记》研究的开展，形成了建国以来《史记》研究的第一个高峰。郑鹤声、季镇淮两先生对司马迁行年和传纪的研究，陈直先生对《史记》名称及早期传播的研究，卢南乔对《史记》体例的研究，侯外庐、任继愈两先生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研究，齐思和先生对《史记》产生历史条件的研究，程金造先生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都独具新见。

在60年代运用唯物史观与丰富史料相结合的方法，平允、准确地全面评价司马迁的思想，并取得显著成绩的，是前辈学者白寿彝先生。他的《司马迁与班固》和《史记新论》，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传统的观点是马班并提。1963年白先生在北师大学报发表《司马迁与班固》一文，洋洋三万言，分了十个专题，从两汉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用纵横的比较方法评介马班史学，提出了新观点。众所周知，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是扬班抑马，而宋人郑樵的翻案又太偏颇，明清人的传统观点是马班并提。白先生研究了两汉历史及史学的发展，正确地指出了司马迁的《史记》是“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的，拿出的是“自己独到的见解”，具有进步的异端思想，即人民性的成分；而班固的《汉书》却是“答复如何维持目前局面”的，只是把两汉的历史写出来，“用五经的道理将上下二百年历史妥贴讲通”，维护汉室的正宗思想。所以无论从体裁的创造上，还是历史的识见上，班固都不能与司马迁并提。《史记新论》是与《司马迁与班固》蝉联完成的姊妹篇，写成于1963年，1981年求实出版社出版。这两篇论文上溯西周共和以来七百余年的历史发展，探索《史记》的写作背景，第一次将司马迁自己揭示的《史记》要旨三题，即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了贯通的评述。这一时

期还对《史记》的阶级属性，司马迁的道德思想，关于游侠问题等展开了讨论。

80年代以来的当代《史记》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不仅是二十世纪《史记》研究的全面丰收期，也是两千多年来“史记学”发展的高峰，将作为本题的第三个层次列为专题来谈。兹从略，详后。

2. 二十世纪《史记》研究的特点 这里着重讨论研究方法的改进，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带来的新局面。

(1) 运用唯物史观，把《史记》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科学的考察、分析和评价。古代传统研究对司马迁“一家之言”的思想只有零星的探索。而且立论肤浅，例如“史公三失”，争论两千年也没把它说清。明清评点家对司马迁思想不乏精到见解。但总体上却是偏重辞章技巧，因而陷入寻章摘句中，又刻意追求史公微文，往往断章取义，任情附会，脱离历史实际。这是缺乏唯物史观就事论事的必然结果。当代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把司马迁的写作活动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提示了司马迁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且能够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分析这种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6页)。这种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考察司马迁思想的方法，在50、60年代，人们还很陌生，对司马迁思想的考察忽左忽右。50年代有拔高的倾向，如说司马迁是“人民歌手”，“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等。到了60年代，出现了贬低的倾向，如有人认为，司马迁的历史观，只不过是由“英雄史观、历史循环论、神学史观等糅合于一体”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体系”，他“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所宣扬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等等。唯物史观方法，在80年代以来宽松的学术氛围中为新一代论者所普遍掌握，